

汉藏语同源研究

吴安其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汉藏语同源研究

吴安其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苏幸

封面设计:王英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藏语同源研究/吴安其著.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2. 2

ISBN 7—81056—611—3

I. 汉... II. 吴... III. 藏汉—同源词—对比研究—汉语 IV. H21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2421 号

汉藏语同源研究

出版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 100081
	电话: 68472815 68932751 传真: 68932447
印刷者	北京华正印刷厂
发行者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毫米) 1/16 印张: 21 $\frac{1}{4}$
字 数	500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1056—611—3/H.66
印 数	801—2800 册
定 价	42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著作出版推荐意见书

吴安其先生所著《汉藏语同源研究》一书,与影响很大的马学良主编《汉藏语概论》、白保罗著《汉藏语言概论》比较,有自己的特点。马著主要是描写,语料限于中国境内。白著主要是比较和构拟,材料陈旧。吴著有描写,也有比较、构拟,语料较新、较广,除了主要论述汉语、苗瑶语、侗台语、藏缅语外,还涉及了南亚语和南岛语。

书稿用一章的篇幅引用考古学和民族学的新成果,论述了操汉藏语的族群的起源、迁徙、分布和文化沉积,使语言研究在文字记载,和民间传说之外,增加了一条新的路子。

书稿把汉语、苗瑶语、侗台语、藏缅语的构拟都上溯到了较早的时代。构拟古音在收罗、筛选语料,吸收前人成果、解释错综语音现象方面难度都比较大,作者不回避这些,都作了大胆的评论和假设。

书稿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如:说汉藏语的人是末次冰期(一万多年前)从南方迁到黄河中下游的。ʔ尾是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中下游古代语言的区域特征。ʔ尾与-p、-t、-k尾不同,前者构成舒声韵,后者构成促声韵。上古汉语有许多由单辅音充当的前缀和后缀,它们有构词或构形功能,但不单独成音节。汉语、侗台语、苗瑶语的上声(B调)是由上古的ʔ尾转化来的,苗瑶语的去声(C调)形成于开尾音节和鼻尾音节。苗瑶语的鼻冠音是从声母中塞音后的-r或-l转化来的。藏缅语的许多前置辅音在古代是带元音节。苗瑶语和孟高棉语有一些词来源相同。汉语、苗瑶语的长短音区别是后起的等。这些新观点,有的很有说服力,有的虽不一定能得到学术界的公认,但对开展讨论是有促进作用的。

这部分稿不仅论述了亚洲、太平洋地区的语言源流,也论述了有关民族的族源和接触关系,这对探讨这一地域的稳定和发展有参考价值,因此我乐意推荐它出版。

陈其光

2001年10月9日

著作出版推荐意见书

在语言系属分类上,汉藏语系曾被认为是人类最古老和最庞大的语言群体之一,但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及来自国际学界的质疑,这个语系是否存在的科学依据正在受到动摇,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焦点和难点问题,传统的理论方法对此显然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吴安其先生的这部新著试图从较新的角度研究汉藏语的分类问题。虽然本书的结论同意我国传统的汉藏语分类意见,但是在方法和运用语料方面与传统的研究有较大的不同。

首先利用了比较丰富如可靠的考古学资料论证了原始汉藏语群体的分布和源流关系,使汉藏语群体的人类学渊源向上大大地推进了一个时期。这样的结论显然只靠语言学的材料和方法不能得到证实。

其次在比较研究所依赖的语料方面引用的更为丰富,不仅包括国内的有关语言,还涉及国外周边地区的南亚语和南岛语的材料。不仅视野更加开阔,还有利于与国际学术界的对话和接轨。

第三是着重语言中核心词的比较。核心词是语言中比较稳定和具有人类语言普遍性的结构部分,它们的构成情况和源流关系对于说明语言的系属情况比一般词汇更加重要。但是现行的核心词与原始语言相比可能已经面目全非,因此比较和考证的难度是很大的。本书几乎对公认的人类语言 100 个核心词在汉藏诸语中做了逐一的考察,运用非常微观和广征博引的方法证明了诸语言核心词的发生学或借贷关系,对确属同源的词敢于坚持,对互相借贷的词也不回避,这种方法和态度是科学的。

第四是对相当数量的词汇形式和原始形态做了比较严谨的构拟,构拟需要系列的或系统的语料支持,这不同于单个词或形态的对比,因此没有足够准确的材料和严格的方法是难以实现的,但是构拟一旦成立,对于语言的同源关系将具有难以推翻的说服力。

当然我认为汉藏语的系属分类问题还将继续开展下去,新的突破很大程度将依赖于语料的进一步发掘和理论方法的更新(例如基于计算机语料库语言学)。尽管如此,安其先生的这部著作至少向人们展示了这个问题研究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所运用的理论方法及得到的结论对关心这个问题的学者是极富启发性的。我相信本书的面世将会受到学界的瞩目,从更重要的意义上说,本书对于完善和发展形成于印欧语言历史比较法,用于解释亚洲语言的发生和演变问题,是极富建设性意义的。

黄 行

2001 年 10 月 19 日

目 录

第一章 方言和谱系树	(1)
一 方言的形成	(1)
1. 社团方言的形成和交替	(1)
2. 方言的底层	(2)
3. 语言接触的影响	(4)
二 方言的演变和创新	(9)
1. 方言的演变	(9)
2. 方言的创新和方言的划分	(12)
三 谱系树	(19)
1. 谱系树	(19)
2. 方言的格局	(21)
第二章 汉藏文化的历史背景	(24)
一 蒙古人种的形成和南北不同的文化	(24)
二 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末次冰期后的早期文化	(27)
1. 黄河流域的早期文化	(27)
2. 长江流域的早期文化	(29)
3. 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早期文化与华南文化的关系	(30)
三 黄河流域新石器中期的文明	(33)
1. 仰韶文化	(33)
2. 马家窑文化	(35)
3. 大汶口文化	(35)
四 长江中下游地区新石器中期的文化	(36)
1. 屈家岭文化	(36)
2. 薛家岗文化、北阴阳营文化和马家浜文化	(37)
五 新石器晚期黄河长江流域的文化	(38)
1. 黄河流域的文化分布	(38)
2. 长江流域的文化分布	(39)
六 夏代黄河长江流域的文化	(41)
1. 黄河流域的文化分布	(41)
2. 长江流域的文化分布	(43)
七 商代的文化分布	(45)
1. 商文化的分布	(45)
2. 先周文化	(47)
3. 黄河上游地区的文化	(47)
4. 蜀文化和大墩子—礼州文化	(48)
5. 先楚文化和吴城文化	(48)
6. 湖熟文化和江南的土墩墓文化	(49)

7. 东南沿海地区的文化	(49)
八 西周时期的文化分布	(51)
1. 黄河流域的周文化	(51)
2. 长江中游地区的文化	(53)
3. 长江下游地区的文化	(53)
4. 长江上游地区的文化	(54)
5. 东南沿海地区的文化	(54)
九 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分布	(55)
1. 黄河流域的文化	(55)
2. 楚越文化	(56)
3. 巴蜀文化	(57)
4. 云贵地区的文化	(58)
5. 岭南地区的文化	(58)
十 两汉时期的文化分布	(59)
1. 岭南地区的文化	(59)
2. 江南和浙闽地区的文化	(60)
3. 云贵地区的文化	(61)
第三章 汉藏诸语的文化源头和支系	(63)
一 汉语的源头和汉语的方言	(63)
1. 汉语的源头	(63)
2. 汉语的方言	(65)
二 藏缅语的源头和支系	(67)
1. 藏缅语的源头	(67)
2. 藏缅语的支系	(68)
三 侗台语的源头和支系	(71)
1. 侗台语最初分布在长江下游地区	(71)
2. 侗台语的支系	(72)
四 苗瑶语的源头和支系	(73)
1. 原始苗瑶语史前分布在长江中游地区	(73)
2. 苗瑶语的支系	(75)
五 汉藏语的谱系关系	(76)
第四章 汉语古音构拟	(77)
一 上古汉语的韵尾和声调的起源	(78)
1. 上古汉语的 *-g	(78)
2. 上古汉语的 *-r	(81)
3. 上古汉语的 *-s	(82)
4. 上古汉语的 *-ʔ	(84)
5. 汉语声调的起源	(87)
二 上古汉语的元音系统	(88)

1. 中古的元音系统	(88)
2. 上古的元音系统	(89)
三 上古汉语的声母	(90)
1. 塞音声母	(91)
2. 流音及其复辅音	(91)
3. 章组是带前缀音的 *-l-	(94)
4. 上古汉语的介音	(96)
四 上古汉语的形态	(98)
1. 上古汉语的使动前缀	(99)
2. 上古汉语的完成体前缀	(100)
3. 上古汉语的鼻音前缀	(101)
4. 上古汉语的后缀	(102)
第五章 藏缅语古音构拟	(106)
一 藏缅语的分类	(106)
1. 藏缅语分类的依据	(106)
2. 藏缅语的发生学分类	(109)
二 原始藏羌语的语音	(110)
1. 藏羌语的声母	(110)
2. 藏羌语的前缀	(115)
3. 藏羌语的元音	(117)
4. 藏羌语的辅音韵尾	(119)
三 原始缅语的语音	(121)
1. 原始缅语的声母	(122)
2. 原始缅语的辅音韵尾和声调的来历	(131)
3. 原始缅语的元音	(139)
四 原始景颇语的语音	(143)
1. 景颇语的声母和紧元音	(144)
2. 景颇语声调的来历	(144)
3. 原始景颇语的声母	(145)
4. 原始景颇语的元音	(152)
5. 原始景颇语的韵尾	(155)
6. 景颇语的前缀	(157)
五 原始藏缅语的语音	(160)
1. 原始藏缅语词的语音形式	(160)
2. 原始藏缅语的声母	(164)
3. 原始藏缅语的韵尾	(169)
4. 原始藏缅语的元音	(173)
5. 原始藏缅语的前缀	(176)
6. 原始藏缅语的后缀	(179)

六 藏缅语的核心词	(183)
1. 自然事物	(183)
2. 身体部位	(184)
3. 动植物	(185)
4. 动作和感觉	(187)
5. 状态	(188)
6. 其他	(189)
第六章 侗台语古音构拟	(192)
一 台语古音构拟	(192)
1. 台语的声母	(192)
2. 台语的元音和韵母	(199)
二 黎语古音构拟	(202)
1. 黎语的声母	(203)
2. 黎语的元音和韵母	(207)
3. 黎语声调的来历	(208)
4. 古黎语的形态	(211)
5. 黎台语声调比较	(215)
三 仡央语古音构拟	(219)
1. 布央语的调类和声调的来历	(220)
2. 布央语清浊调的声母	(224)
3. 布央语的元音和韵母	(226)
4. 仡央语的送气音和复辅音	(227)
5. 原始仡央语的声母	(230)
6. 仡央诸语的声调	(232)
7. 原始仡央语的元音和韵尾	(233)
四 原始侗语的声母和韵母	(236)
1. 原始侗台语的声母	(237)
2. 原始侗台语的元音和韵母	(242)
五 侗台语的核心词	(247)
1. 自然事物	(247)
2. 身体部位	(248)
3. 动植物	(249)
4. 动作和知觉	(250)
5. 状态	(250)
6. 其他	(251)
第七章 苗瑶语古音构拟	(253)
一 勉语古音构拟	(253)
1. 古勉语的声母	(254)
2. 古勉语的元音	(257)

二 苗语古音构拟	(260)
1. 古苗语的声母	(260)
2. 古苗语的韵母	(268)
三 原始苗瑶语的语音	(273)
1. 苗瑶共同语和原始苗瑶语的声母	(274)
2. 苗瑶共同语声调的来历	(278)
3. 原始苗瑶语的元音	(282)
四 原始苗瑶语的核心词	(286)
1. 自然事物	(286)
2. 身体部位	(287)
3. 动植物	(288)
4. 动作和感觉	(288)
5. 状态	(289)
6. 其他	(290)
第八章 汉藏语的同源关系	(292)
一 汉藏语的前缀和后缀	(292)
1. 汉藏语的词根和形态成分	(292)
2. 汉藏语的前缀	(293)
3. 原始汉藏语的后缀	(297)
二 原始汉藏语的语音	(302)
1. 原始汉藏语前缀和后缀的形式	(302)
2. 原始汉藏语的辅音	(303)
3. 原始汉藏语的元音	(305)
三 汉藏语核心词比较研究	(307)
1. 自然事物	(308)
2. 身体部位	(309)
3. 动植物	(310)
4. 动作和感觉	(311)
5. 状态	(312)
6. 其他	(313)
四 核心词词源关系	(314)
1. 侗台语核心词的词源关系	(314)
2. 苗瑶语核心词的词源关系	(321)
五 汉藏语的语序	(327)
1. 藏缅语的语序	(327)
2. 汉语的语序	(328)
3. 侗台、苗瑶语的语序	(328)
4. 原始汉藏语的语序	(329)
主要参考文献	(330)

第一章 方言和谱系树

一种语言有多少种方言,实际上就有多少种不同的亲属语。以历史语言学的观点看,亲属语和方言是一码事。语言和民族关系的研究中把一个民族所使用的有共同来源的土语群看作是同一语言的不同方言。萨丕尔说:“已经知道是在起源上有关系的语言,也就是说,从单一原型分出来的各种形式,可以认为是一个‘语系’。”“在研究过程里,随时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的一线光明,指出一个‘语系’不过是一个更大的语群的一个‘方言’。方言、语言、语族、语系,不用说都是纯粹相对的名称。当我们的眼光扩大了或缩小了的时候,名称可以改换。”^①可见亲属语的谱系分类和方言的划分也是一码事。方言总是处于缓慢变化中。方言的变化可以从一代一代人所说的话有所不同中观察到。

一 方言的形成

1. 社团方言的形成和交替

语言分化为不同方言的原因一般认为是人群的迁移造成的。索绪尔解释说:“语言的分化正是由时间因素引起的。地理差异应该叫做时间差异。”“每一个创新都是在一定的地区,在分明的区域内完成的。要么,某一创新的区域遍及整个地区,不造成任何方言的差别(这种情况最少);要么,像通常所看到的那样,变化只影响到一部分地区,每个方言事实都有它的特殊区域;二者必居其一。”^②一种地方话中往往有新、老两派的社团方言的存在,这就是我们研究的出发点。

1935年李方桂先生调查武鸣壮语时记下了这种壮语的地方话中有 pl-、ml-和 kl-这样的音位。^③梁敏先生80年代到广西南宁西郊下楞乡调查发现当地老年人的方言中还有 pl-、phl-、kl-、khl-、ml-,30多岁的人中这些复辅音已简化。马关县木厂乡大坝村50岁以上的人中元音 a 还有长短的对立,同村的40岁以下的人中这种对立已经消除。^④

孙宏开先生在羌语调查中发现:“北部方言麻窝话,在老年人口语中分舌面前和舌面中两套塞擦音,而有些青年人把这两套塞擦音都读成了舌面前塞擦音。”“南部方言的曾头话,在老年人和壮年人口语中分舌根和小舌两套塞音,而一些青年人都读成了舌根音。此外在复辅音

① 萨丕尔《语言论》,陆卓元译,陆志韦校订,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37页。

②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岑麒祥、叶蜚声校注,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77页、279页和280页。

③ 李方桂《武鸣僮语》,中国科学院出版,1953年。

④ 梁敏《两代人之间的语音变化》,《民族语文》1987年第3期。

方面也有差别,在老年人口语中,复辅音和单辅音是分开的,而一些青年人口语中都读成了单辅音。”^① 就是在我们身边的北京话中也发生了这样的交替现象,这一点下文还会谈到。

语言的变化是在旧的基础上产生新的系统,常常是新的与旧的并存,经历了一段时间以后新的代替了旧的。我们往往没有觉察到一地的方言常常演变为另一种方言。一种语言分处两地,只有经历了相当一段时间以后,它们的系统分别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两种不同的方言。

一地的方言还可能不止两派。赵元任先生在《汉语口语语法》和《语言问题》中都提到了北京话儿化韵老派和新派的不同。李思敬先生发现有老派、半老派和新派的区别。老派和半老派不同的如:“棒儿” $pa^{\circ}l/p\bar{a}^1$,“秧儿” $ia^{\circ}l/i\bar{a}^1$,“凳儿” $t\dot{a}l/t\bar{a}^1$, (赶)“明儿” $mi\dot{a}l/mi\bar{a}^1$ 等等。老派和半老派相同,新派不同的如:(一)“撇儿” $phi\dot{a}l/phi\bar{a}^1$, (一)“把儿” $pa\dot{a}l/pa^1$, (人)“家儿” $t\dot{c}ia^{\circ}l/t\bar{c}ia^1$, (开)“花儿” $xua^{\circ}l/xua^1$ 。^② 我们应当承认从音系上说,新派、半老派和老派是3种稍有不同的结构。老派方言一般代表该方言稍早一段时间以来的面貌,新派方言往往要成为方言今后一段时间的主流。不同年龄层次的新老派的并存为日后方言的变化和替换做好了准备。新派方言的源头是老派方言。方言本身词汇的变化是最常见的。不用说新老派某些词汇的不同可能如同两代人之间的代沟,就是老派内部也总会启用或流传另一些词。语言作为一个系统,语音的变化最能说明问题。新老派语音的不同或许不足以分辨出来,经历了几代之后,语音个别的变化和进一步发生的条件音变以及音位结构的变化总是不可避免的。

新派的语音变化应追溯到年轻人的语言环境。一个派别(社团)的方言是由一定数量的“个人方言”组成的。一个人的发音习惯和对音位的分辨是在幼年和少年期中形成的。人们的心理语音结构是他们的社会所决定的,也就是母语环境所决定的。那个母语环境在古代可能是氏族或部落,后来是村庄或城邑,今天除了村庄外可能是街区及学校。相同的母语环境总是产生相同的心理语音结构,相同的“个人方言”。尽管这个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棵树上的叶子不管有多少,差别总是很小的,一个方言的派别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

语言分化的根本原因是自身的演变。分处两地的相同的方言,由于各自的演变最终要成为不同的方言。语言的演变受自身结构的制约往往有一定的趋向。如汉藏语系众多的语言分别经历了声母的简化、声调的产生,浊塞音和浊塞擦音的清化等等演变阶段。但演变的不平衡性使得不同的系统可能处在不同的演变阶段。系统以外的其他因素,语言的底层和表层也可能使演变一定程度上产生偏离。萨丕尔说:“语言自成为一个潮流,在时间里滚滚而来。它有它的沿流。即使不分裂成方言,即使每种语言都像一个稳固的、自给自足的统一体那样保持下来,它仍旧会时时离开任何可以确定的规范,不断发展新特点,逐渐成为一种和它的起点大不相同的语言,一种实际上的新语言。所以,方言的兴起不是由于单纯的个人变异,而是由于两个或更多的群体分隔到一定程度,足以分流下去,或者说,独立地而不是共同地流下去。”^③ 语言总是处在新方言不断地产生,新方言不断地代替旧方言的过程中。

2. 方言的底层

19世纪印欧语的研究中提出了底层理论。当一种语言分布到另一处时,原本不使用这种语言(或方言)的居民集体转用这种语言时就把母语的成分作为底层成分带进了外来的语言中

① 孙宏开《羌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1年,第5页。

② 李思敬《汉语“儿”[ɛr]音史研究》,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25-132页。

③ 萨丕尔《语言论》,陆卓元译,陆志韦校订,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34、135页。

去。底层语言可能对外来语言结构的演变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不是借用,而是底层的影响。这不能与洋泾浜现象混为一谈。“洋泾浜语”的使用者坚持自己母语的语音,采用了其他语言的数百个词,在有限的场合中使用。使用者另有母语。语言的语音和形态都是较为严密的系统,不能由两种不同的系统混合而成。^① 底层的确会很快地使外来的语言成为一种新的方言。外地的普通话往往是北京普通话的变体。如粤方言广州语缺少舌尖塞擦音,吴方言一般没有舌尖后塞擦音只有一种塞韵尾。外地老一辈人的普通话往往与北京的普通话差别较大,年轻一代的普通话好一些。北京话的轻声和多音词的重音大多为北京的普通话所采用。普通话多音词的重音绝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区别意义的作用,外地人讲普通话时一般不会注意到这一点。北京以外的地区人们有自己的方言或语言。普通话只在一定的场合使。普通话不是他们的母语或“母方言”。他们的普通话在语音、词汇和语法上可能与北京的普通话很接近,也可能差别较大。50年代时我们在农村和城市中都碰到掺杂着本地方言词,用本地口音讲的“普通话”。这种洋泾浜式的普通话与北京的普通话差别较大。带有外埠色彩的普通话在一定范围内,譬如说机关和学校中,可能成为一种社团方言。

当外来的语言(或方言)不足以完全纠正底层语言的作用时,新的方言必定带有本地的特征。梅耶也承认标准法语无论在哪个外省都不能学得很正确,感到有“本地底子”(substrat local)的影响。由于母语的影响“个人方言”带有自己的特征。它们是言语,不是语言。只有有了新的一致约定,往往是它们成了新的母语时才有新的方言或语言。不稳定的非母语的“个人方言”群(或称为中介语)与有稳定底层特征的方言应有本质的区别。

汉语吴、闽、粤等方言确有一种非汉的“本地底子”——底层语影响的遗存。这些方言中都有像侗台语那样把“先吃”、“先走”说成“吃先”和“走先”。“先”字见于甲骨文,古文中“先”作为修饰动词的副词,一般放在动词之前。如,“先正其心”(《礼记·大学第四十二》,“先犯陈蔡”(《左传·僖二十八》),及“捷足先登”、“先知先觉”等。壮语的“先” $ko:n^5$ 只能用在动词后面,“先吃”说 $ku:n^1 ko:n^5$ 。傣语“先去”说 $pai^1 on^1$ 。^② 温州话“先吃”说“吃爻先”,瓯江北边的乐清话把“先”字换成“起”字,说 $tshə^2 ga^2 tshi^3$ 。吴方言中的这类用法不是直接来自古侗台语等。古吴方言大约南北朝之前已为中原古方言所代替,大约隋唐之时才产生与今吴方言有系统上的承传关系的原始吴方言。故今吴方言的这类句法现象可能来自隋唐之前的古方言。温州话管咸菜叫“菜咸”,生鱼腌成的菜叫“鱼生”,腌的萝卜叫“菜头生”等。

据说印度雅利安诸语 l-和 r-混淆,一向的解释归因于若干底层语言不能区别这两个音。后期雅利安语的名词变格把同样的格尾加在单数和复数的不同词干上,同达罗毗荼语一样。^③

底层语对外来语语音结构的演变可能有一定的影响。原始侗台语的塞音是四分的,吴方言的是三分的,可能是带有先喉塞音的吴方言的底层方言使吴方言的一些地方话的塞音走上不同的演变道路。汉语上古塞音结构有三分和四分两种意见。李方桂先生主张三分,双唇音构拟为 *p-、*ph-、*b-,中古亦是如此。吴方言一些地方话相承的原始方言双唇塞音的声母应是 *p-、*b-、*ph-。p-、p-仍保存在上海,浙江等的许多土语中。1884年派克(Parker)调查发现温州城区居民大部分已把 p-、p-读成 p-、t-,现已都读作 p-、t-。永康、缙云等地的 p-、

① 梅耶《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68页。

② 王均等编著《壮侗语族语言简志》,民族出版社,1984年。

③ 布龙菲尔德《语言论》,袁家骅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579页。

ʔd-只出现在不带鼻音尾的韵前,带鼻音尾的韵前分别演变为 m-和 n-,声调为阴调类。缙云话“饼”meiŋ³，“钉”neiŋ¹。^①而浙江南端的庆元吴方言的演变是另一个路子。并、定两母已清化，帮、并、滂分别为 ʔb-、p-、ph-，端、定、透分别为 ʔd-、t-、th-。见母多为 k-，或读作零声母。^②根据南方诸方言的这种情况陈忠敏认为是古百越语底层的表现。侗台语的 ʔb-和 ʔd-也有类似于汉语吴方言等的演变。^③

布龙菲尔德称“底层理论”为“神秘的说法”，但他又承认这种“神秘”的作用。如西班牙士兵当初到了智利，与当地的印第安土著女人结婚，结果智利失去了印第安语。而智利的西班牙语语音上不同于拉丁美洲其他地方上层社会的西班牙语。当初第一代的子女从他们的母亲那里继承了不完善的发音。^④

使用非本地语的居民所学会的本地话可能对地道的本地话产生影响。汉语曾受到阿尔泰语系语言的影响。桥本万太郎先生在《语言地理类型学》中讨论过汉语从南到北主要方言中不同音节数量逐渐减少，声调数减少，而北方方言复音词较多。^⑤一方面是北方方言声、韵、调简化，复音词增加，另一方面北方方言既向南方发展又对南方方言有所影响。语音和形态的演变都是语言内部的事，但系统结构的某些支撑点受影响可能引起整个系统的变化。晚唐北方方言中浊上变去的过程应是先有上声分阴阳，然后才有全浊声母的上声和去声的调值相同。可见晚唐以前南北方言在声调结构上还是比较相近的。北方方言全浊声母（浊塞和浊塞擦音声母）的清化发生在宋代，至元代已入派三声——全浊归阳平、次浊归去声、清音归上声。其过程应是入声先分化为三类，然后才能分别与阳平、去声和上声的字同调。入声字有塞音尾，一般读得较短促，既然可与其他调合并，应先变得与那些调调值相同。北方方言塞音尾的简化唐时西北方言中已经开始。-p 尾的消失可以引起 -m 尾的消失，-p、-t、-k 合并为 -ʔ 时入声短促的调值仍可维持。南宋时北方方言的主要地区仍有人声，到了元代才消失。12、13 世纪时讲阿泰语的人学说汉语大约与解放以后南下的人员到南方一带学说南方话差不多，很难学得像。如果这一类北方人讲的南方话成为风尚，就可能对本地话有所影响。

3. 语言接触的影响

王力先生谈到过西洋语对“五四”以来的汉语的影响。“五四”以前的白话文中“一个”着重是指数量，“五四”以后“一个”、“一种”等像英语不定冠词那样加在了名词之前。如，“其实这在我不能算是一个打击”，“只有一个虚空”（鲁迅《伤逝》）。现代汉语的联结法、共动和共宾的平行式、插入法，都是模仿西洋语法的结果。^⑥侗台语中出现的是模仿汉语的语序，如把名词的修饰语放到前头，副词“先”可前可后等。语言之间的影响谈得最多的是借词，实际上经过本地话的语音和词法改造之后，借词对系统未必有多大影响。

5 世纪时盎格鲁、撒克逊和朱特三支使用相近方言的日耳曼人从大陆入侵不列颠岛，他们的语言为古英语的不同方言。日耳曼人二千几百年前生活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以及与之

① 陈忠敏《作为古百越语底层形式的先喉塞音在今汉语南方方言里的表现和分布》，《民族语文》1995 年第 3 期。

② 秋谷裕幸、曹志耘《浙江庆元方言音系》，《方言》1998 年第 1 期。

③ 洪波《台语声母 ʔb、ʔd 的变异》，《民族语文》1991 年第 1 期。

④ 布龙菲尔德《语言论》，第 578 页。

⑤ 桥本万太郎《语言地理类型学》，余志鸿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年，第 104 页至 115 页。

⑥ 王力《汉语史稿》（中册），中华书局，1980 年版，第 464 页至 474 页。

近邻的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英语属日耳曼语族西支。1066年诺曼人征服了英国,从此法语成了英国的官方语言达3个世纪之久。直到14世纪英语的地位重新被确立。这一时期用英语创作的英国著名的诗人乔叟(Geoffrey Chaucer, 1343—1400)的作品中半数的词是罗曼语借词。英语在中古时期还借入了一些法语的词缀,如-age, -able, -ess, -ment, -ance。英语也先后从拉丁语那儿借来一些词缀。但英语决不是因此变为一种混合语。中古时期英语在词法形态上发生的根本性变化是以词尾变化为主要特征的屈折形式的逐渐消失。中古时期英语的名词失去了性的标志,因此形容词也失去了这一类的标志。名词仍有单、复数之分,但词尾的形式已趋向统一和简化。多数的动词成为规则动词,动词词尾的变化也趋于简化。词序开始成为表达语义的一种手段。^① 英语从一种带较多屈折形态的语言成为以分析形态为主要特征的语言,是一种系统结构的变化。

萨丕尔把语言的历史演变称为“沿流”。他说:“我们环顾一下流行的语言习惯,大概不会想到我们的语言有一个‘坡度’,下几个世纪的变化可以说正在今天的暗流里预先成形,这些变化一旦完成,就能看出它们不过是过去已经发生的变化的继续。”印欧语的7个格到了古日耳曼语中已简化成4个,“盎格鲁-撒克逊语和中古英语在这方面更进了一步”。“一经诺曼人征服,英语本身的沿流上就像发生了点什么,叫它欢迎新词。新词补偿了它内部正在削弱的那点东西。”^②

汉字在汉语方言中往往有多种读法,一般有反映当地话本来说法的白读和借自标准语等的文读两类。不同历史时期的标准语(或普通话)或其他权威方言那儿传播来的读法成为不同的文读。如“车”在温州话中可读作 tshɛi¹ 和 tsho¹。前者是白读,如农具“水车”、“风车”的“车”读作前者。后者是文读,“汽车”、“黄包车”的“车”读作后者。我们常常拿方言的字音声韵的所属与《切韵》的比较说明它们的特点。如果文读的字较多,文白两种读法可以总结出同一个音位系统上的两种声韵结构。这时文读反映的是其他方言的声韵结构。但音位系统的面貌可以用来说明方言的历史归属关系。如自北方方言宋代全浊声母清化以后,来自北方的古全浊声母字的文读就不会再有浊音了。吴语北部方言的土语,即使有许多来自北方的文读,如阳上读作去声等,但白读字仍保持着全浊声母字读浊音(或清音浊流),塞音、塞擦音的清、清送气和浊三分这样的特征。汉语方言中除了各声韵类的白读反映着方言延续的声韵语音系统外还有一些较为零星的白读是不属于这个系统的。如温州话“反”白读 pa³,又读作 fa³。“反”属合口三等,非轻唇的读法是上古方言读法的遗存现象,对于吴方言来说,是一种底层。只要我们认识到文读是来自其他方言的借词和方言中后起的词,少数与方言声韵结构不合的白读往往是底层词,方言词和方言的来龙去脉就清楚了。

历史上的亚欧大陆曾经是部落语言的世界。如今天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只有400多万人,但有500多种语言。在有统一语言的大民族形成以前,欧亚大陆上可能有数千种语言,由于交际的需要许多语言已经消亡。

从另一个角度看,亚洲的阿尔泰、汉藏、印欧和南亚诸语的存在已有数千年了。印欧语的印度—伊朗语族的语言在南亚一些地区代替了达罗毗荼语,但没有使它们消亡。尽管语言之间有很多接触,许多不同的部落结合或融合成民族,真正“混合”而成的语言是罕见的。在欧洲

① 秦秀白《英语简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第70页至74页。

② 萨丕尔《语言论》,第139、147、153页。

和亚洲,语言之间的发生学关系基本上清楚的。

语言间词的借用是很常见的,即使是最温和的词扩散,也使语言的词汇起很大的变化。而语言的一部分词比较稳定。一种语言中这样的词总有数百个,它们被称为核心词。原始藏缅语在距今四千多年前就开始分化了,但藏缅语族内部不同的语言的天、地、日、月、鼻、手、乳以及第一第二人称代词仍有同源关系。

语音和语法都有一些在同样条件下要变大家都变,要不变大家都不变的约束。萨丕尔说:“一种语言的语音格局不是不能改变的,可是它变得远比组成它的各个声音为慢。”如英语的首辅音系列与梵语的至今仍然对应。^①

阿尔泰语和汉语的接触已有数千年了,但迄今为止还没有见到语法形态是这两种语言混合出来的第三种语言。梅耶说:“事实上,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遇到过任何例子,可以使我们断定某种语言的形态系统是由两种不同语言形态混合而成的。”^②

语法类型相近的语言接触时可能借用语法功能成分。如壮傣语支的语言有汉语那样的“了”和“着”。^③ 汉语大约在二、三千前就出现了分析形态,虚词“了”和“着”是汉代以后才有的,汉语和侗台语的分化是在更早的时期,壮傣语的这些功能词是从汉语借的。英语曾从拉丁语和法语借用某些后缀,但英语的形态结构与它们的是不同的,非分析形态的语言互相接触可能产生分析形态的语言。如英语和斯堪的纳维亚语以及法语的接触,使英语带有分析形态的特征。^④ 但没有一种语言的形态不是自身演变的结果。

古高丽文化二千多年中发展为现代的朝鲜文化,在这个过程中朝鲜语借用了许多汉语词,日本列岛上的居民南北朝时开始就借用了许多汉语词。他们在吸取汉文化的同时把汉字作为自己的文字达一千多年之久。朝鲜语、日语和越南语中的汉借词如同侗台语和苗瑶语的汉借词,在词汇中所占的比例较大,是不同时代借入并积累起来的。但有这样的一种语言,它们在较短的时间里用其他语言的词代替自己的词,所替换的词可以占到词的百分之八九十。这种现象一般发生在没有一种现成的语言或方言可以作为族际交际语的情况下。这种以一种语言的语音和语法为基础,大量采用另一种语言或数种语言的词为基本词的语言被人们称为混合语。

沙拉马卡语是苏里南丛林黑人的语言。这些黑人的祖先来自西非。18世纪时他们反抗奴役逃入丛林,使用这种语言。这种语言以西非班图语的语法为语法,基本词来自英语,混有葡萄牙语和西非语言的词。西非班图诸语是南岛语那样的粘着语,有日语那样的开音节,有音节声调。于是沙拉马卡语的词也带音节声调,使用开音节。下面是沙拉马卡语的一句话:efi ju: sei: ju: he de, te ju: baj hati:, pe ju: poti: eŋ. (如果你卖掉你的头,再买顶帽子,你把它戴在哪儿呢?)^⑤ 丛林黑人逃入丛林以前在种植园时有的讲葡萄牙语的犹太人的黑奴,这一部分人还把葡萄牙语的词带进了这种混合语中。

① 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68页。

② A. 梅耶《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第68页。

③ 邢公畹《现代汉语和台语的助词“了”和“着”》,《民族语文》1979年第2期。

④ P. 特鲁杰尔《语言接触与语言变化——论克里奥耳式语言的产生》(黄行译),《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13),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印。

⑤ 布龙菲尔德《语言论》,第585页。

菲律宾的查瓦卡诺语(Chavacano)是以菲律宾语的语法为一方,西班牙语词为另一方的混合语。斯里兰卡的克里奥马来语(Sri Lankan Creole Malay)的语法是斯里兰卡摩尔泰米尔语的,马来语的词汇。^①吉普赛人的罗马尼混合语(Romani),印地语的语法,欧洲不同语言的词汇。爪维语(Javino),爪哇语语法,西班牙语词汇。波丢语(Petjo),马来语语法,荷兰语词汇。^②

在美国暑期语言学院编的《世界的民族语》(Ethnologue Languages of the World)所列的 6700 种语言(其中一部分通常认为是一些语言的不同方言)中其中的数十种认为是混合语和洋泾浜语。

混合语经历了两三个世纪或更长的时间以后,演变的结果使人们不易从语音或语法上寻找它们的来源,但词的来源较易通过比较研究予以确认,它们往往与一些势力强大的语言有关系。如西加勒比克里奥尔语(Western Caribbean Creole English)是以英语词为基本词的混合语,它的语法据说受过西非的阿坎语和班图语的影响。^③我们猜想它的语法是在西非的这一类语言的语法上发展起来的。

在语言频繁接触的地区可能产生洋泾浜语(Pidgin),尤其是码头上和海员中,使用洋泾浜语的码头人或海员都有自己的母语。洋泾浜语的词汇和语法规则都较简单,不能算是真正的语言。如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调查过的部落语,其复杂程度并不逊色于现代“文明人”的语言。真正的语言没有一种是简单的。

越南的皮钦法语(Vietnamese Pidgin French),始于上个世纪 60 年代,在越南军警中使用,1954 年法国人离开越南之后就没人说了,但洋泾浜语(或称为皮钦语)有可能发展为混合语。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托克皮辛语(Tok Pisin)是以英语词为基础的皮钦语,1982 年统计在那儿已有 200 万人以其为第二语言,5 万人以其为母语。洋泾浜语一旦丰富到可以作为母语,成为母语之后由于交际的需要又得以发展,就成为所谓的克里奥尔语,即混合语。美国人冯·奈姆(Van Name)在上个世纪就提出克里奥尔语是从洋泾浜语发展而来的。^④

语言的词汇通常是上下都是补丁的“百衲衣”,大部分文化词都是借词。但核心词通常比较稳定。核心词的借贷和改变有一定的速率。如中古时期法国人占领英国,一连 300 年英国的国王都说法语,上层社会和宫廷中也使用法语,法语词大量进入英语。有人认为这段时间的英语已成为克里奥尔语,也许当时的英国某处有过以法语词为基本词的洋泾浜语或克里奥尔语,但现代英语的前身一定不是克里奥尔语。因为法语并没有把英语的核心词给换掉。英语仍以正常的保留率保留着古英语的核心词。^⑤ 英语与同一语支的德语比较相近的词达 60%,与罗曼语族的法语比较相近的词为 27%,与斯拉夫语族的俄语比较为 24%。南非的荷兰语(Afrikaans)有不同时期马来语、班图语、葡萄牙语的借词,但它是不是混合语不能凭这一点来决定。如果把词汇来源复杂,借词较多的语言都算作混合语,问题倒是变得简单了。

广西融水永乐乡的一种方言叫做五色话。罗美珍先生和邓卫荣认为五色话是“一种受汉

① Ethnologu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Eleventh Edition, Barbara F. Grimes,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Inc. Dallas, Texas.

② Notes on Linguistics, February 1997,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③ Ethnologu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④ 石定栩《洋泾浜语及克里奥尔语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国外语言学》1995 年第 4 期。

⑤ 徐通锵《历史语言学》,第 415 页。